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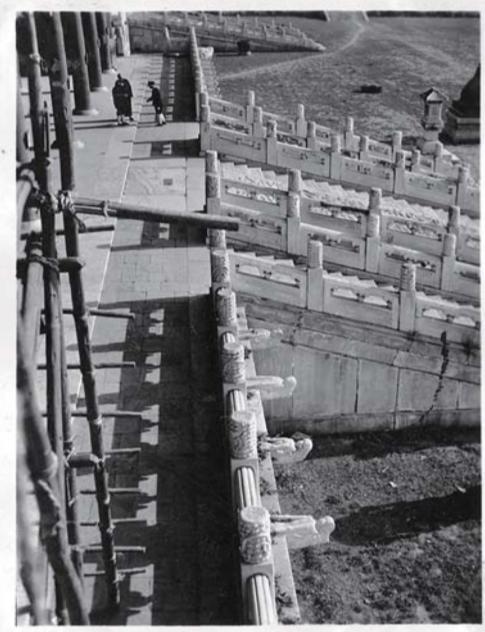
本刊主编:姜锦铭

值班责编:李牧鸣 刘小草

邮箱:worthreading01@163.com 电话:(010)880513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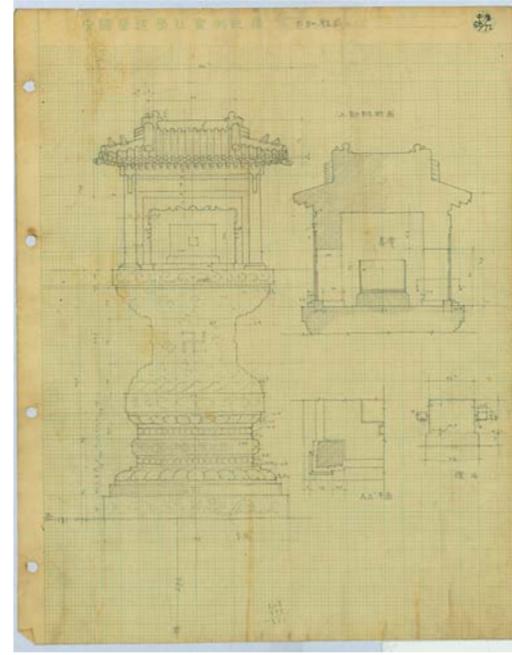


▲北平故宫弘义阁下檐琉璃套兽。
▼北平故宫太和门上搭建的测绘用脚手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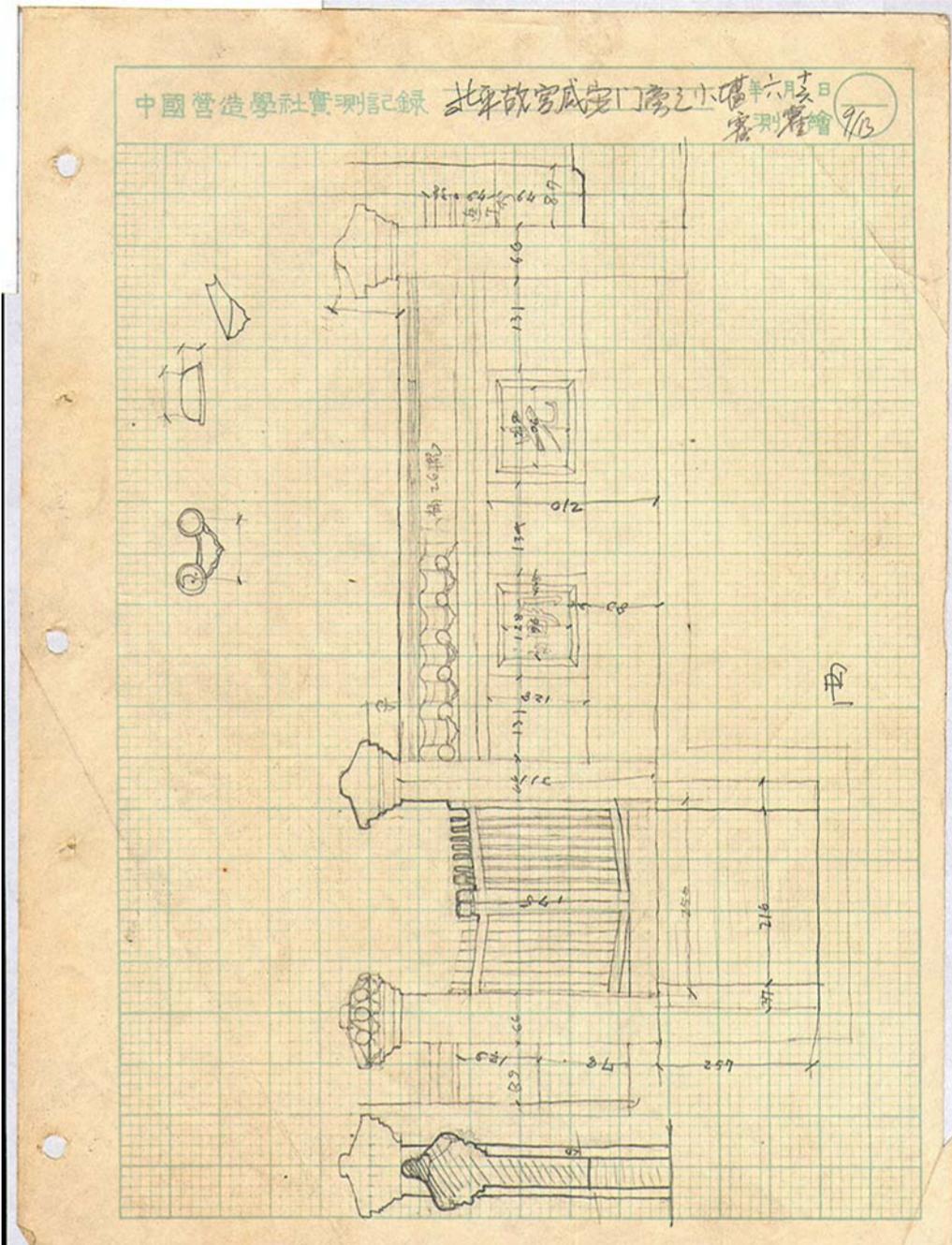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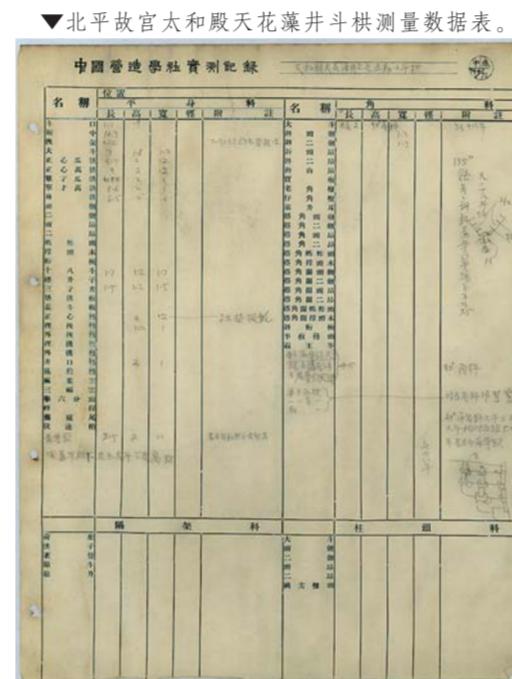


测绘紫禁城

战争阴影下，营造学社为北平古城
抢救下一份空前绝后的珍贵记录



▲北平故宫太和殿前嘉量测稿。



▲北平故宫西华门内咸安门旁小墙测稿。

特约撰稿刘梦雨

1932年10月，故宫博物院的总务处长俞星枢正在为文渊阁犯愁。

这座乾隆年间修建的皇家图书馆已经在紫禁城的东南角矗立了将近两百年，木质的楼面与梁柱被七万多卷的《四库全书》压得不堪重负，上层楼板日渐凹陷，安放其上的书架也随之变形，显出倾圮的势头。虽然故宫方面早些年已经为此将《四库全书》全部取下，另外装箱，存入别库，但文渊阁楼面岌岌可危的状况仍然如故。

两年前，文渊阁的管辖权刚刚从古物陈列所移交给故宫博物院，建筑维修的职责自然也归于故宫博物院的总务处。年久失修的木建筑，结构形变日增，遇上狂风骤雨，往往便有倾圮之虞。因此，总务处不得不操心起文渊阁的修缮问题。

修理古建筑，毕竟不比寻常房屋修缮。文渊阁因其特殊功能导致的楼面凹陷，也远远超出普通匠人的经验范畴。面对这样一座在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建筑，如何才能整复如故，使之免遭倾圮，而又不致成为破坏古物的罪人？

站在文渊阁下，俞星枢想到了一个人——朱启钤。

溯源：抢救文渊阁

如今朱启钤的名字为人所知，多半是因为他创办了营造学社。这个中国第一家研究古建筑的专业学术团体，在学术史上几乎是个传奇般的存在：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以短短17年的历史，十余人的规模，完成了将近两千座古建筑的调查，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史和建筑理论的研究范式，独力开创了一个学科。

但营造学社只是朱启钤一生中开创的诸多事业之一。作为北洋政府大员，朱启钤曾在熊希龄内阁担任内部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在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留下诸多掌故，其中之一，就是他与故宫博物院的渊源。

人所知，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由明清故宫改造而来。但很少有人记得，这场从宫城禁苑到公共博物馆的大变革，其发起人和主持者，正是朱启钤。

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是以1914年古物陈列所成立为起点的。1912年溥仪逊位之后，仍然居住在紫禁城的后半部，而前半部——也就是“外朝”部分，则收归国民政府内务部管辖，在朱启钤的主持下，用于筹建中国第一所国立博物馆——古物陈列所。

1914年，古物陈列所正式成立，经过数月筹备整修，当年秋天对外开放，举行文物展览，“往观者老幼男女络绎不绝”，为一时盛事。

1924年，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又在后宫部分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一度与古物陈列所成为并存的两个机构，直到1947年合并。因此，古物陈列所今天被公认为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身兼学者与官僚双重身份的朱启钤，素来对中国传统建筑与城市规划问题关心有加。这既然是他的工作职责，也是他的个人学术兴趣与修养。在并不算长的京都市政督办任期内，朱启钤的不少举措影响深远，延续至今：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整理北京街市沟渠，建设管理北戴河海滨为公共旅游风景区，以及将社稷坛改造为北平

第一座对民众开放的公园——中山公园。

作为一名主管市政建设的官员，朱启钤的愿景，是在保留古都风貌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北京的现代城市化改造。他以自己的识见眼光，为这座城市奠定了现代化的良好开端。

洪宪称帝失败后，朱启钤逐步退出政界，一方面兴办实业，一方面潜心学术研究。1930年，朱启钤赁下北平宝珠子胡同的一处房屋，在此创办了营造学社，延揽一批优秀的学者和建筑师加入，以“沟通儒匠，发达智巧”为宗旨，致力于营造学研究。两年后，梁思成和刘敦桢先后进入学社任职，分别主持法式部和文献部。中国古建筑研究由此开辟出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回到1932年，俞星枢为文渊阁修缮事宜请来的专家，正是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和刚刚加入学社的梁思成和刘敦桢。

在实地勘察之后，梁刘二人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蔡方荫合作，对文渊阁的主要构件荷载进行了一番缜密的结构力学计算，得出结论：文渊阁所用大梁，以断面面积及材料密度计算，本应能够承载楼面荷载，问题出在这些大梁用的不是整块木料，而是小料拼合，导致其承裁力减半，因此梁身逐渐向下弯曲，楼面也随之凹陷。病因既明，一份科学的修缮计划也得以详细拟定。

彼时，中国的建筑保护事业刚刚拉开帷幕，作为这场征程的起点，营造学社将古老的紫禁城带到了时代的最前沿。

使命：补图学术书

勘察文渊阁，并不是学社第一次参与故宫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早在1931年，朱启钤发起故宫角楼修缮工程，会同多所机构成立了一个修缮城楼委员会，营造学社即在其内，负责方案审查和工程验收。这是营造学社第一次参与古建筑修缮实务。

两年后，学社再次受故宫博物院委托，勘察测绘景山万春、辑芳、周赏、观妙、富览五亭，并为之作修缮设计。几年下来，结合其他工程实践积累的经验，营造学社已经在纯粹从事理论研究的学术团体之外发展出一个新的身份，成为当时北平最专业的古建筑修缮咨询团队。因此，故宫方面对于营造学社的倚重便不难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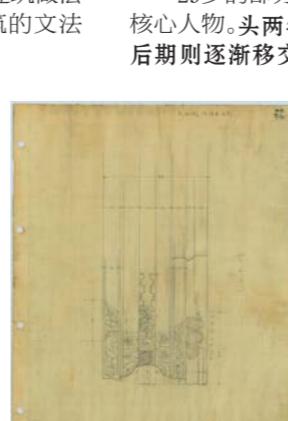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营造学社也同样需要故宫。

营造学社早有解读清代官式建筑做法的学术愿景。有清一代注重则例编纂，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建筑术书《工程做法》。按照梁思成的说法，这部记载了清代官式建筑做法和工料用例的专书，堪称一部清代建筑的文法课本。



◆北平故宫太和殿东南角套兽俯视。

◆北平故宫太和殿须弥座石刻测稿。



队伍：恰风华正茂

1933年，朱启钤以营造学社社长名义致函古物陈列所，请求进入故宫测绘。古物陈列所很快回复同意，给五位工作人员——梁思成、邵力工、王蕴华、莫宗江及“仆役一名”——颁发了临时门证。他们五人是参与测绘的第一批工作人员。此后，又有其他成员陆续加入这项旷日持久的工程。

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时年32岁的梁思成以法式部主任身份担纲，其余几位测绘主力，也都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人。

29岁的邵力工是这个项目中仅次于梁思成的主要负责人。头两年的测绘工作由梁思成主要负责，后期则逐渐移交给邵力工。与众多声名显赫的同僚

相比，邵力工这个名字，在营造学社的成员中并不醒目，但在学社的早期活动中，作为学社的法式助理和绘图员，他承担了大量的勘察测绘工作。可惜许多成果未能最终完成发表，使他没有在学术史上获得应有的声名。

17岁的莫宗江是梁思成的助手，15岁那年进入学社担任绘图员，后来升为研究生。虽然没有上过建筑系，但对建筑与绘画有极高的天赋和悟性，使他很快就成为学社最出色的绘图员。如今声名遐迩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中那批精美的插图，便出自莫宗江之手。

麦伊曾和纪玉堂也是这项工作中的主力。麦伊曾是康有为的外孙，母亲康同薇是康有为的长女。1934—1937年间，麦伊曾一直在营造学社做研究生，参加过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地许多田野调查和测绘工作。在北平，除了故宫之外，他还测绘过北海静心斋。

纪玉堂是学社另一位测绘人员，参与过学社最重要的田野调查——发现佛光寺。抗战爆发后，他没有随学社主力南迁，而是留在北平。日后学社资料遭水灾损毁，他还曾参与过测稿的整理和补绘，也是一位贡献良多却默默无闻的工作者。

参与测绘的人员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王蕴华。她并不是学社的职员，而是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东北大学的建筑系，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在1928年亲手创办的，头几届学生都与他们有深厚的师生之谊。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建筑系的一批学生流亡至北平，生计无着，梁思成就设法安排他们在营造学社工作。其中一些学生也参与了故宫测绘。

纪玉堂是学社另一位测绘人员，参与过学社最重要的田野调查——发现佛光寺。抗战爆发后，他没有随学社主力南迁，而是留在北平。日后学社资料遭水灾损毁，他还曾参与过测稿的整理和补绘，也是一位贡献良多却默默无闻的工作者。

当时的华北已经笼罩在战争阴影之下。朱启钤知道，调查工作必须抢在战争来临之前。这些脆弱而易燃的木构建筑，根本经不起哪怕一颗炮弹的袭击。一触即发的局势下，每座建筑的生命都已进入数字未知的倒计时。

于是，对营造学社而言，无论出于古迹保护的实务，还是基于古建筑研究的学术需要，测绘紫禁城，都成为一项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的任务。

凭借之前与故宫数次合作的良好基础，这项承载着营造学社学术使命的宏大测绘计划，很快启动了。

随着工作的深入，学社成员们逐渐意识到，这次测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对古建筑保护的迫切需求。

于是，对营造学社而言，无论出于古迹保护的实务，还是基于古建筑研究的学术需要，测绘紫禁城，都成为一项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的任务。

于是，对营造学社而言，无论出于古迹保护的实务，还是基于古建筑研究的学术需要，测绘紫禁城，都成为一项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的任务。